

回忆与恩师赵明义先生相处的日子

郭士民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恩师赵明义先生溘然长逝虽然已经过去五个多月，到现在心理上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我还希望这个老人能是赵老师，走近了才会清醒起来，接受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教育事业这个事实。赵老师去世后，赵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会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他对我在读书、思考、写作和教学方面手把手的教导，必将对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永远地产生着影响。

1. 教我读书

我真正学会读书，其实是 2013 年博士生入学才开始的，之前的只能算作浏览或涉猎。入学后，赵老师就开始要求我读经典。有一次聊起读书，我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一小时能读两百页”，赵老师听后大为生气，严格要求我以后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小时最多读 6 页。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提醒我经典文章要精读，要一个词一个句子地反复体会，一定不要贪多。针对如何读经典，他还教会了我他所习惯的记笔记方法，鼓励我要充分运用电脑来记笔记，总之，要做到古人所说的“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的大脑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只有经典读多了，才能形成自己的主见，不至于成为墙头草，写东西也不至于没思路。整个读博的前两年，赵老师经常检查我的读书情况，给我提供一些有关资料的“门牌号”，让我试着去搜集去梳理，为了督促我读书他还主动给我出点小题目让我去搜集资料，以写促读，帮助我学会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读书，使我从一个媒体人开始摸到学术研究的门槛。当然，由于我入学时赵老师已是耄耋之年，蒋锐老师怕累着老人家，帮助赵老师对我进行日常指导。

2. 教我思考

我曾经没有意识到，在认识赵老师之前，实际上我是还不懂或者说还没有学会如何思考的。在博士论文开题后，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了赵老师家里，聊了一会儿我的读书情况，赵老师忽然问我：“六年的媒体生涯到底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一下子愣住了，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读博已经两年了，我甚至连当初为什么要考博士，理由也已经有些模糊了。进入山大以后，我

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目，徜徉书海，与伟大的心灵对话，固然对我是一种熏陶和提高，但是，恰如赵老师所说的，我虽然是在认真读书，但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复述阶段，是出工不出力，本质上是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思考，所以还是免不了陷入拿自己的大脑“当别人思想跑马场”的尴尬。赵老师教育我，思考的前提，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在我们这个学科，思考学术问题时一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政治立场，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要人云亦云，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说，我有那么多次的基层采访经历，有那么多感性认识社会和鲜活生动的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经验，应该更加能够自觉养成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看问题的习惯，使自己的党性修养与学术进步相得益彰。除此之外，赵老师还谈到了正确地思考问题的具体方法，首先是不要违背形式逻辑，是就是，非就非，全称还是特称，概念是不是周延，逻辑上是不是有前后矛盾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要重视辩证逻辑。他说，形式逻辑只是对事实的静态描述，如果要描述动态的事实，还需要掌握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描述的是一个辩证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涉及到的各种事物之间其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他还提醒我说，现在中央文件中提有机统一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所谓有机统一就不是一个机械拼接的过程，如商场的模特，从结构上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但不是有机统一的，有机统一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是整体宏观的，是分析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赵老师还告诉我，只有掌握了辩证逻辑，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一个实践着的、“清醒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改变在写作中老是引用别人的，总是在梳理，却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一个学者，更作为一个党员，他在去年上半年十九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在繁忙的重大课题项目结项工作事务中抽出时间来建言献策，尽到一个“普通党员”的职责。

3. 教我写作

赵老师曾经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写论文，而且很多时候是鼻子上吸着氧气进行的，甚至几次是躺在医院病床上。蒋锐老师曾经说过：“跟老师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都集中在学科”，“因为他整天想着这个，关心这个，所以一谈这个就兴奋”，他总是这样。记得在写一篇由赵老师出的题目的论文的时候，最后到了修改的关键时期，编辑催的很紧，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赵老师。当时赵老师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在忙着结项，经常是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和我坐在电脑前，将两条腿支在小凳子上。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一字一句地推敲。当时赵老师已经 85 岁了，年龄不饶人，身体实际上是在硬撑着，然而经常是我几次催促他休息，他总是说不要紧，再看一段吧。有一天，正在帮我看论文，赵老师突然说感觉血压升高了，就赶紧去吃了降压药，然后又吃了防止心脏病发作的药。之后，他倚在沙发上，使劲儿搓着头发、耳朵和面部，用他自己发明的“数数”的方式使血压降下来，我也急忙地帮着揉搓背部，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而我已经吓得不得了了。而他平静下来以后，第一件事仍然是立即回到刚才谈到的论文话题上，我不敢再打扰，马上从赵老师家回到宿舍，打开赵老师修改过的文章，感觉一阵阵地惭愧，因为他修改的字词、他推敲的更好的说法，他梳理的逻辑，还有那些很难发现的政治立场方面的种种问题，他都改得非常仔细。记得有一次课程论文，交给了赵老师，因为写作的篇章逻辑结构上的一个问题他之前给我提出过修改意见，而我没有改过来，他甚至让我重新写了一遍，而且很严厉地教育我，写论文首先要自己满意，而且这个自己满意不是得过且过的满意，而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满意，这样写出的文字才能掷地有声，才有价值给人看。赵老师反复告诫我，在学术上一定要诚实，不要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想法，因为学术是很严肃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任何文字，如果能有机会流传后世，后人总是很聪明的，总能够看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端倪和小瑕疵，无处可逃，只有最真诚的心、最真的努力，才能跨越时空，得到后人的认可。

4、教我讲课

赵老师每年都坚持给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亲自授课，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的一个月，由于大部分学生从济南搬到了青岛校区，他一直惦记着，最终不顾劝阻亲自从济南坐车到青岛校区讲课。赵老师担心我上课比较忙，抽出时间来我们学校附近和我见了一面，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中午吃完饭，我给他定了房间让他休息，他说：“花那钱干嘛？”就躺在吃饭的房间沙发上睡了一个小时。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会是最后一面，一个月以后，赵老师竟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赵老师的讲课很有气势，很有感染力。在如何讲课方面，赵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记得博士第一学期，在赵老师的课上，我们每人按照要求都选择一个主题，写一篇文章在课堂上讲给大家听，由于我有些

内向，虽然做过很长时间的记者，但出去采访都是一对一，讲课是一对多，当着众人面讲话总是有点不适应，有点紧张，所以轮到我发言就主要是低头念稿子。下课后，赵老师专门给我指出了我讲课存在的问题，告诉我讲课抓住听众所需要的一些技术性知识。之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创造机会让我主动去锻炼。一直到博士论文预答辩，他仍然关心的是我是否能够通畅流利地表达。我永远忘不了，在博士论文预答辩的头一天晚上，他让我带着写好的演讲稿去找他，当着他的面讲给他听，他在旁边给我计算时间，讲完以后，他就给我指出应该改进的地方或表达不妥帖的地方，立即进行修改。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是不是能够受得了，照顾他日常起居的程丽阿姨也过来不断地催促他去休息，可还是一直讲到晚上接近 11 点。担心着赵老师的身体，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宿舍，刚睡下，大约凌晨时分，接到电话，说赵老师嘴角一侧闭合不了，喝水从嘴角往下流，可能是面瘫又犯了。我急急忙忙跑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咨询了医生，拿了药。第二天一早赵老师住进了山大齐鲁医院，这件事让我后悔和自责至今。马上就要毕业了，赵老师得知我要去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还是担心我能不能讲好课，又教了我一些讲课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且提醒我一定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因为在马院工作，教学和科研在时间和精力上是有矛盾甚至是有冲突的，一方面要搞好教学，另一方面要不能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教学，要时刻提醒自己强化问题意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思考和写作，在科研上同时有进步。现在作为一名教师也已经一年半了，每当我走上讲台，尤其是遇到一些讲课的问题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还是赵老师对我的手把手的教育。也由于赵老师的提前提醒，我得以坦然面对和从容处理教学和科研的矛盾甚至冲突，并自觉地处理好两者关系。这些都是赵老师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恩师千古，师恩永铭！